

走出車道溝 的 最初歲月

——貿大老五屆“四個面向”回憶文輯

賈懷勤 主 編
蘇隆中 執行主編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责任编辑：阮珍珍

责任印制：沈德军

封面设计：FEALL 正典设计 .com

封面题字：叶耀培

照片提供：郭玉金



ISBN 978-7-5663-1434-5



9 787566 314345 >

定价：45.00元

走出車道溝的最初歲月

貿大老五屆“四個面向”回憶文輯

主 編 賈懷勤

執行主編 蘇隆中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中國·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车道沟的最初岁月：“贸大”老五届四个面向
回忆文辑 / 贾怀勤主编.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2015

ISBN 978-7-5663-1434-5

I. ①走… II. ①贾…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207 号

© 2015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走出车道沟的最初岁月

贸大老五届“四个面向”回忆文辑

贾怀勤 主编 苏隆中 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阮珍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5.5 印张 304 千字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434-5

定价：45.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全体老五届校友及不同时代关心老五届的朋友们。

并祝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总会成立二十周年！

此书出版承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95 届校友、中博诚通国际技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毛金明先生赞助。

前言

■ 车悟思

老来更知友情贵，人生坎坷贵胜金。五四结集续友谊，蹉跎岁月鉴往今。

——题记

在读者翻阅此书之前，且让我交代清楚“是什么？如何看？为什么？谁来写？”这样四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1）这里面写的是怎样一段历史？（2）如何看待我辈这样一段蹉跎岁月？（3）纂写此书意义何在？（4）作者群体状况如何？

一、关键词解读

【贸大】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简称。尽管文辑作者上学时母校还被称作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简称贸院）。为了与学校 64 年的历史一致，也为了增强后 30 年的校友对文辑的亲近感，文辑标题使用“贸大”一词。

【老五届】简单一点说，指 1966 届至 1970 届这五届（本科）大学生。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备，有几个特殊情况也属于老五届：（1）当时除大多数高校的本科实行五年学制外，但也有少数四年制高校（如师范院校），还有个别六年制高校（清华大学）。“老五届”一词，之于前者一共有 4 届，之于后者一共有 6 届。（2）独立的专科高校和本科高校所办专科，实行三年学制，因此属于老五届的专科生实际上共有 3 届。（3）1964 级和 1965 级研究生，被作为本科生分配工作，也包含在老五届之内。这样看来，老五届当解释为在“文革”前入学、在“文革”动乱中毕业的所有大学生。

【四个面向】“四个面向”指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是当时中央对于老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而之前的分配是为满足国家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高级人才的需要，需要发挥大学生才智的层面，不排斥基层单位，但也包括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大中学校；1949年以后建立的高校绝大多数都是行业、部门办学，对口分配，即便是综合性高校，也遵循专业对口的分配原则。

【车道沟】代指20世纪60年代的贸大校园。老五届在校上学时的校园在海淀区车道沟9号。

二、“四个面向”之对错得失

196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毕业生分配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

自此，“四个面向”成为“文革”前入学的在校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方针。1968年9月，1967届大学生分配，分配时间推迟了1年。同年12月，1968届大学生分配，分配时间推迟了3个月。1970年8月，1969届和1970年届两届同时分配，前者分配时间推迟了1年，后者按时毕业。需要提及的是，按“一号通令”，1969年秋冬，各地高校绝大多数内迁至二线、三线的小城镇乃至农村，老五届最后两届是从内迁地离校的。此外，1966届毕业生于1967年7月毕业分配，当时尚未提出“四个面向”的方针，但是他们在进入工作单位一年后，也按上述第二个文件的精神下放到农村、工厂或部队农场去锻炼。

“四个面向”具体落实起来情况不同。有些大学生是“一竿子插到底”，报到令直接写××省××县，再由县里的人事部门分配至基层单位——厂矿、财贸单位、医院（卫生所）或中小学校。这种分配不可能对口，因为县城没有单位可供“对口”，于是出现学石油的卖酱油，学核能的制陶瓷，学外贸的看仓库的“乱配”现象。另一种情况是，大学生拿到的报到令上打头的词是中央××部——听起来蛮不错，再往下读是具体单位，如建工部的几公司××大队，铁道部××局××段，最后这个具体单位往往是在荒郊野外上、崇山峻岭中。下到这样的单位，就别指望对口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先到部队农场去接受再教育，一年、两年或三年后再接受二次分配。有人最后分配到中央部委，工作基本对口，也有人还是被分配到地方基层，从事不对口的工作。

“四个面向”给贸大老五届造成的反差尤其大。正常年景，贸大毕业生的出口在“三外”：外贸、外交和外宣。毕业生分配到外贸部及其所属的进出口总公



司、外交部和对外宣传单位——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文委）、外文编译局、外文出版社等。外贸经济系的毕业生一般只在外贸系统就业，而英语和小语种的毕业生除外贸系统之外，也有的去外交或外宣部门。上述这些单位都是在北京的中央涉外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有很强的责任感、自豪感，外界则对之抱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感。即便是分配到京外，也都是进出口总公司设在五大口岸的分公司。当时全国只有5个开放口岸——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业内号称“广大上青天”。正因为如此，贸大老五届更要经历一番较之于工科、农科和财经学科其他专业的同学更为“触及灵魂”的“革命”。

至于分配地域如何确定，当时有个顺口溜：“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儿）。”凡是在校期间建立了明确的异性朋友关系的一对儿，会分配到边远省区，如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家里有生大病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有可能分在近处（对北京生源而言河北是近处）；那些没有照顾父母借口的又没处对象的，往往分配到不远不近的地方（对北京生源而言河南、山西、辽宁、吉林等省是不远不近）。

李文启是北京商学院的老五届。因为他是演艺圈的大腕，有电视台对他进行过专访^①。他于1966年分配到四川某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成为该农场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队员。这为他以后“逆袭”演艺界奠定了基础。他回忆当时在部队农场时，穿的是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上面打了十七八个大小不等、磨损程度不同的补丁。这些军装本来是准备去当擦炮布的，你可想而知旧到什么程度。每天排队上下工，被驻地群众误认为是一批特殊的劳改犯。这在我们这本文辑中也有同样的回忆词句。

为什么对老五届实行“四个面向”，这当从那个年代的大背景来认识。首先，对老五届大学生的性质定位。我们自己常说，5年之间，从“小闯将”沦落为“末代臭老九”。到底什么使然？对此开展研究得不多。有一篇文章^②说得较为深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但在运动初期，大学、中学学生则似乎是个例外，一度成为革命的‘闯将’、先锋和主力。直至1967年底，毛泽东还曾设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和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但这种赞誉和信任并未持续多久。1967年革委会陆续成立后，从‘文化大革命’全局和发展顺序来看，在认定已经解决了运动的主要对象——‘走资派’后，在认为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工人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① 2014年6月30日央视7频道“军旅文化”播出的李文启专访。

② 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09）期。



后，红卫兵‘先锋’、‘闯将’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而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来。”

试想，“文革”批判17年^①中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当然包括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教育出来的大学生，不经过深刻的工农兵再教育，不经历一番刻骨铭心的改造，如何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所需要的人？如此说来，“四个面向”是达到此目标的不二途径。

然后，我们把视野从老五届扩展到全国各阶层。从大办“五七干校”，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镇居民下乡务农、“不在城里吃闲饭”，到机关、高校和工厂向三线疏散，全国各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向基层转移。这主要是“文革”政治运动的需要，再加上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后战备的需要。按照当时的提法，这些措施“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②。经历了改革开放，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做法，包括对老五届实行“四个面向”分配方针，是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损害，对人才的摧残，尽管客观上使这些被下放者经受了艰苦锻炼，磨炼了意志，深入了解了国情。

2011年1月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③对此做出了非常客观、准确的论述：“广大干部（包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者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三、编纂此书所为何来？

编纂老五届回忆文辑意义在于：其一，回顾艰辛历程，倾诉苦情衷肠。其二，寄语晚辈青年，吃苦积累财富。

老三届这个词比老五届响得多，皆因这个群体背负了更多的苦难，后来也涌现出诸多风云人物。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周年、30周年和40周年为契机，全社会几番掀起老三届纪念潮，创作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纪实性报告和文艺作品。至于老五届，则很少有什么东西问世，以至于某些人自嘲为“失声的一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各种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中捕捉到老五届的信息。

一位北京铁道学院1967届毕业生，当年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基层工程队，

^① 指1949~1966年。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他解释说：“对于这段历史，史书记载和口碑史料并不多见。也许是时间较短，也许是单纯劳动没有什么可记述的。于是，成了一段‘断代’的历史。我想在这里把这段于今已超过40年的往事实录下来，或可续史之无，补史之缺。”^①

复旦大学1970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在校友聚会时说：“我们这几届是比较特殊的，人生跌宕起伏，受苦受难的30年我们都赶上了，改革开放又是直接参与者。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我念念不忘的那些事情，就是人生的那些经历，这是最大的财富。倒不是为了出书扬名，就想将来写点东西给我的孩子，给我的朋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学长、学姐、学弟、学妹都差不多有那么一个特点，总之，感觉到我们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少数老五届毕业生也曾编印、出版过回忆录或诗集。但集中回忆老五届“四个面向”往事的作品，所见甚少。早者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一套三本《“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作者出自山东省内外数所高校。近者有九州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同年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和法语1968届毕业生为入校50周年编纂的纪念册《五十年之路》^②。有些事情，当年校友见面时曾经畅叙；另有些事情，打算一直压在心底。口头上叙过的，最好留在纸上；闷在心里的，到了这把年纪，还是倒出来为快。

我校老五届2000余人，迄今尚无回忆文集问世。校友总会编写的《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2006年版）和《校友风采》（2011年版），虽然也记述了多名老五届校友，但是都是褒扬其职业成就和社会贡献，对其早期基层经历或者没有提及，或者一笔带过。我们早就打算编纂冀大老五届“四个面向”回忆文辑，这次终于付诸行动。我们把老五届设想为本文辑的第一个读者群。

了解老五届这代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生有益无害，他们可以成为本文辑的第二个读者群。正如本文第二大段所写，老五届当年在基层吃了那么多的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他们后来的成长有好处。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不要把“人上人”理解成骑在“下人”头上作威作福，而是要理解成比一般人更有志气、更有能力、站的层次更高、对国家更有贡献。李文启回忆说：“这些经过磨难的同学既未怨天尤人、怀忧丧志、一蹶不振，也没有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碌碌无为，而是脚踏实地、重新学习、努力奋进，他们自己的力量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他们之中有的在新的领域建树颇丰，有的身居要职，大多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并获得了累累硕果。”“苦是最大的财富。”^③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在蜜罐中长大的，没有吃过苦，没有经过挫折的磨炼，适当

① 石玉林，回忆文革后大学生毕业后的集中劳动，文史精华，2011年第06期。

② 当年北京外国语学院1968届毕业生与北京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外语专业的同届生一同在唐山柏各庄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因此北外这部纪念册记述了这4所高校的军农往事。

③ 2014年6月30日央视7频道“军旅文化”播出的李文启专访。



地吃些苦、收些磨难，对你们的长远发展有益。你们应该有正确的苦乐观。

今天，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民族每一分子都应该万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国家再也禁不起折腾，路线和政策再也不能发生颠覆性错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发起违背宪法、侵犯人权、摧残文化的“运动”，绝不能再发生！我们希望人们以史为鉴，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因此，我们设想此专辑有其更广阔的读者群。

四、说明和鸣谢

贸大老五届接受“再教育”的地域甚广，从塞北高原处女地到西南深山铁道线，从天山脚下的毛皮晾晒场到黄浦江畔的供热大炉旁。行跨工农兵学商五业，涉“工”的下到工厂车间和建筑工地，涉“农”的下到军垦农场，涉“兵”的直接入伍当现役军人，涉“学”的下到中小学当教师，涉“商”的下到商店、餐馆当营业员。当年对外语院校毕业生集中进行“再教育”的部队农场，南有牛田洋，北有柏各庄，都有贸大老五届的身影。

自征文发起以来，得到许多回校友回应，他们关注此事，祝愿成功。但是有的校友由于年老视力不济而不能写稿，也有的忙于抚养第三代而没时间写稿。最终共收到文章 33 篇。按作者届别分，计 1966 届 1 人，1967 届 5 人、1968 届 7 人，1969 届 6 人和 1970 届 14 人；按当年所在系分，计外语一系 13 人、外语二系 7 人、外贸经济系 12 人和前马场校区 1 人。他们当中有 16 人经历了部队农场的锻炼，有 10 人分配到工厂，其余的人也大都分配到基层商贸单位和中小学。整体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 33 篇文章的排列顺序，首先是按届别高低；同届按系别，顺序为外语一系、外语二系、外贸经济系和前马场校区外语专业；同届同系按班次排序；同班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前言作者署名“车悟思”，取车道沟老五届“四个面向”之意，盖因本书之成功乃创作集体的贡献。本书主编对前言文字负责。

从 2014 年 1 月发起到现在付梓，历时 18 个月，得到各方面关心和支持，再次一并致谢。

特别要感谢 1995 届校友、中博诚通国际技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毛金明先生的资助出版。

目 录

牛田洋纪实	郭玉金 (001)
人生经历的新起点——工厂当车工	金仁康 (013)
建工基层十年	朱景琪 (019)
天山脚下的岁月	张平生 关玉如 (025)
悠悠 45 载, 难忘军垦情	贺锁荣 (038)
草原上的白云, 山谷里的风	刘金禄 (045)
难忘的岁月	邵宝康 (054)
校园情怀, 情谊相守	韦文健 (059)
我的 1968—1979	汪家树 (062)
我在援外医疗队当翻译	陆文民 (068)
大学毕业后的曲折人生	黄提多 (074)
军垦农场“再教育”纪事	齐光临 (078)
从学兵连到军工科技翻译	杨新华 (082)
陇南山村旧事——踏上社会的最初岁月	王培德 (086)
在成昆铁路工作的岁月 (外一篇)	吴肇荣 (094)
挥别车道沟, 到了“老君炉”	王国娟 (106)
魂兮基层话当年	徐林生 (112)
从通化到燕化: 专业对口前的十五年	张 义 (124)
踏上社会	梁廷泉 (128)
一个“末代臭老九”的拼搏历程	叶佩学 (131)
我庆幸选择了教师职业	卓振英 (140)
我的毕业与归口心路	刘竹林 (144)
通渭县农村旧事拾遗	景春平 (153)
迈向辽宁外贸的艰苦历程	董汉仁 (159)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郑成秀 (164)
六年磨炼, 一生受用——1970 年至 1976 年经历散记	陈云达 (166)
渤海滩头的磨炼——唐山军垦生活追忆	高德可 (171)
我的川渝教育生涯——基础教育篇	王久渊 (181)



—————• 走出车道沟的最初岁月

路：张北十年所走过的	贺宝贵 (188)
留住岁月的记忆	王芳芬 (192)
生涯的三部曲	张从洲 (199)
身处热河旧地，涉业工农商学——“四个面向”的九年	贾怀勤 (208)
南国基层外贸人	林宝应 (222)
附：文外箴言	(230)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代跋）	苏隆中 (233)

牛田洋纪实

1966 届外语一系二班 郭玉金*

据《汕头大事记》载：1969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半，第三号强台风在本区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登陆时，汕头、澄海、潮阳、南澳等县，平均风力在 12 级以上。这次台风正值大潮期，风、潮、雨交加，汕头市区海潮急剧上涨，全市受浸，水深 2.3 米，郊区及各县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深 4 米左右。强台风造成公路交通瘫痪，通讯联络全部中断。为保护这片新垦的土地，当时 55 军驻守牛田洋生产基地的部队官兵与在该基地锻炼实践的 2 183 名大学生，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暴风潮的战斗，共抢救遇险群众 3 700 多人，动员帮助 6 400 多名群众安全转移，而部队和大学生在抢救海堤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有 470 名官兵和 83 名大学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当时官兵、学生无私无畏开展劳动生产及抗灾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据统计，汕头受浸水稻 42 万亩，其他作物 45 万亩；崩塌民房 141 025 间，仓库、工厂 3 502 间；崩决堤围 316 540 米。全区死亡 894 人；水里到处浮着尸体。有人还穿着那一身橄榄绿的军装，衣扣扣得十分整齐，大多数尸体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这次强台风是汕头解放后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一次。

——题记

光阴荏苒，岁月悠悠，牛田洋的浪涛声早已不复闻问，但 2004 年 12 月印度洋的那场海啸，却突然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当时，我在印尼泗水刚参加完一场婚礼，又去巴厘岛玩了几天，后回到雅加达和亲朋好友一起欢度圣诞夜，并订好

* 郭玉金，1961 年入学，本应于 1966 年毕业。1965 年，因为工作需要提前毕业，留校任教。



了27日回北京的机票。但就在26日早晨，当充满浓郁热带风情的千岛之国还在酣睡时，9级大地震发生了，圣诞的快乐骤然被地震而引发的印度洋海啸所吞噬，所有的电视频道都是关于TSUNAMI的报道。此情此景，一下子又把我带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牛田洋的那场灾难……

“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句话耳熟能详，但灾难发生时，当时媒体对灾情并未能作如实报道，报刊上所能看到的几篇报道仍然只是关于牛田洋军垦农场官兵，以及在那里“接受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同台风作斗争的“英勇事迹”。而我们这些当事人，或有人称之为“牛友”，在往后的岁月里，由于各种原因，也都无暇去回首那残酷的经历。但我想，灾害也许不可避免，但悲剧完全可以避免重来，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牛田洋军垦农场简介

牛田洋位于汕头市西郊。稍微上点年纪的都应该记得，那里曾是一片海滩，潮涨时淹没，潮退时干出，面积足有万亩，这就是牛田洋。1962年，在“与海争地海让路，向山要粮山听遣”号召和鼓舞下，数万名解放军官兵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开进牛田洋进行围海造田，历时4年，围出七八平方公里的良田来，并开始了粮食生产。大海真的为人类让了路，沧海变桑田似乎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长久和艰难。

我们是在1968年秋天从北京来到西牛田洋军垦农场的。当时中央下达了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全国好几万的大学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和部队农场，机关干部也分期分批地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和我们一起来到西牛田洋军垦农场的，大部分是66、67、68届外语院校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刚分配到外经贸部、外交部、七机部等国家机关的大学毕业生。和我一样1965年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也都未能幸免，因为当时学校也都已“停课闹革命”。

初到牛田洋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海滩，只有一些地方有水稻和水塘。团领导给全团官兵和大学生作动员报告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把荒凉的牛田洋变成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大粮仓。

开始军垦农场的生活

我们所在的连队是西牛田洋唯一的女子连，近140人，分成三个排，除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和一排排长是部队正规军人外，其他都是“娘子军”。我们



北京来的近40个人编在第一排，住在一间草棚里。第二排是四川人，第三排是广东人，大部分都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农出身。也许是担心北京人不大容易服管吧，三个排中只有第一排排长是军人，来自湖南，肤色黝黑。连长和副连长都是广西人，文化素质虽然不高，但很有人情味儿，也很体谅人。

初始，我们对部队生活都觉得挺新鲜。早晨连长一吹起床哨，大家就以最快的速度爬起来，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儿，穿好衣服和鞋，然后以排为单位，在毛主席像前做“早请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之类的，接着边唱边跳“忠字舞”，但没跳几下，就得纷纷举手向连长请假，奔向厕所，很快那里就排起了长队。也难怪，一百好几十号人的连队，只有七八个坑，还都是“开放”式的，所以在里也要养成“快”的习惯，一方面是无法忍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盯着，另一方面也无法忍受坑内散发出来的恶臭。

整个连队只有我有台小半导体收音机。大学时我每晚睡觉前都要戴上耳机听长篇评书，听完了才安然入睡。到了牛田洋，我这台半导体就成了全连的公共财产，每天吃过晚饭，每人带着小马扎，到草棚前面的空地上一起听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晚上我也不好意思问连长要回来，因为吹熄灯哨子时我们都必须遵守作息制度睡觉。再说，劳累了一天，根本就没有精力听评书，倒下就能睡着。

连队生活非常单调，偶尔团里放露天电影，也是那“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不仅是我们这些“牛友”都睡着了，连那些军人也都一个个趴在膝盖上抬不起头来。于是，趁电影倒卷的空隙时间，就有军人连队领唱革命歌曲，唱完了就喊口号：“女子连，来一个！女子连，来一个！”然后呱呱呱使劲鼓掌。慢慢习惯了这种连队生活后，看电影时我们的连长或排长也会领着“娘子军”去唤醒别人。

农田劳作

在连队，我们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下田劳动，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数九寒冬，劳动时间一般都超过八小时。农忙季节则整天都泡在水田里干活，有时一日三餐都是由炊事班用扁担挑着饭送过来，然后我们在田边吃。茫茫荒野，也没有个方便之处，我们女子连只好每天带一个床单，如厕时三个人一围，解决问题。后来连长用竹子和草席帮我们做了一个流动茅房。

一望无际的“海田”下面都是淤泥，耕牛下不去，铁牛（拖拉机）就更不用提了，只能靠人去拉犁拉耙，部队的小伙子四个人拉一部，我们女生则需要6个人拉。为避免海蛎壳割破脚，大家必须穿着军鞋下去。每次上岸后，鞋里总要抖搂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蚂蟥。刚开始我们吓得大呼小叫的，但后来也习以为常了。好在海田蚂蟥不叮人。



连里三个排各分配了几块深浅不同的水田，其中属水齐腰深的最不好干，秧子插下去就漂起来。我们北京人干活确实比不上四川和广东人，她们用扁担挑稻秧那么轻松，还能颤悠颤悠地在崎岖小路或田埂上一路小跑，而我们在平地上挑都一扭一歪的，下雨路滑时还经常栽跟斗。但我们也并不甘心落后，常常咬紧牙关拼命挑，一天下来两个肩膀都肿起了大块紫红血包。

部队插秧要求也和列队一样，向前向右看齐，前后左右间距一样，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笔直的一条线。因此无论是部队连还是学生连，都采取了拉线的办法，插完一行，再把线往后挪。我们插秧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每次插完一块地，上来一看也很整齐，还不漂秧，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

表彰好人好事

刚开始，二排和三排受到表扬的机会多一些，巾帼英雄都集中在她们那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连、排长总在我们田里帮忙，慢慢地也发现了我们一排的优点，尤其一到政治学习或议论国家大事，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因此，团里要求写稿子，表扬好人好事，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这些任务全都落在我们一排头上。

我和另一位当过老师的“牛友”，除了和大家一起干农活外，还要天天写稿子，因为吃晚饭时要宣读。交给团里的稿子还必须加上《人民日报》上的红色边框，并且每一篇都必须“上纲上线”、“穿靴戴帽”，否则就得退回重写。有一次，连里指定我为一个受到表彰的“牛友”写一篇稿子，团参谋找我谈话，先是要提纲，然后使劲拔高度。比如说，脚割破了就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向英雄董存瑞、黄继光或红军长征学习，轻伤不下火线……因为写得太高尚，被表彰的人后来都不好意思念稿了。

加固海堤

农闲时我们就抬石头、挑沙、挖泥加固海堤。汕头地区人多地少，女人一般都不下地劳动，只在家里负责做点家务和绣花，即便是汕头男人，好多人也成天跷二郎腿泡茶馆。因为种的是三季稻，所以我们很少有农闲时刻，因此附近的农民都说我们比他们辛苦得多。

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任务，从一艘机船上卸水泥。由于水浅，船靠不了岸，只能架两块长木板，一袋一袋卸到岸上。一袋水泥有50公斤重，部队小伙子一个人扛在肩膀上，我们只能两人抬一袋。谁知道两个人抬比一个人扛还更难，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掉进水里，下面又都是尖利的牡蛎。因怕别人讥笑我们是